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

馬 彪

如果拿一本《後漢書》去問中小學生：你讀過這本書嗎？回答大概多是“沒有”！但如果問：你知道東漢有位不屈服權貴的“強項令”董宣，還有位“暮夜却金”的廉潔大臣楊震嗎？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誰不知道呀！教科書裏讀到過。其實，他們“讀到過”的課文就出自范曄的《後漢書》。

《後漢書》雖為私家修史卻被列入正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說起來雖然所謂“前四史”都算是私修國史，班固因此還遭訴訟坐過牢獄，但畢竟司馬遷是太史令，班固是蘭臺令史，陳壽是著作郎，他們修國史都是有朝廷資格證的。然而范曄就不同了，他因事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¹用今天的話說，范曄不過一介業餘作家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業餘”有時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後漢書》最終超越“規範”，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獨創的原因雖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略的。

無論如何，《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漢獻帝之間約二百年的歷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一、《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

經常有學生提出《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我回答：是范曄、司馬彪。《後漢書》的紀、列傳是南朝劉宋范曄（398—445）所撰，八志是晉朝司馬彪（？—306）所撰。兩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以他們雖然都是作者但不是同時代的合作者。

實際情況是先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八十篇，這是一部“通綜上下，旁貫庶事”，²紀、志、傳俱全的東漢史。在此一百多年之後纔有了范曄的《後漢書》，由於此書尚未完成時作者去世，所以書中只有紀、傳而缺少志。又過了五六十年，梁朝劉昭見范書缺志，就抽取晉人司馬彪《續漢書》的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³此說雖見於范曄《後漢書》的南宋紹興刻本，但不見於《梁書》本傳⁴。無論如何，劉昭的“以合范史”之舉充其量不過是個人行為，“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⁵又過了近一千年，在北宋乾興年間纔由當時的“國子監孫奭建議校勘，以（劉）昭所

1（梁）沈約：《宋書·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80頁。

2（唐）房玄齡：《晉書·司馬彪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141頁。

3（梁）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中華書局，《後漢書》附錄第2頁。

4（唐）姚思廉：《梁書·文學列傳·劉昭傳》曰“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稱其著有“《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中華書局，1973年，第692頁。

5（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2頁。

注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為一編。”⁶即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與范曄《後漢書》的紀、傳九十卷合刊，成為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一百二十卷《後漢書》。

必須指出，常見的那種所謂司馬彪“續作八志”的說法，以及自劉昭開始范書已與司馬彪志合成一書的觀點都是誤解。

由此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史記》、《漢書》同樣也是多位作者撰寫，為何只提司馬遷、班固呢？回答是：因為那是家學著作，撰述人是合作者關係，他們在共同認可的宗旨、編纂原則框架之下從事的是集體創作，所以確實存在一個“主創人”。但是，《後漢書》的兩位作者並非如此。所以準確地說，此書的第一作者是范曄，第二作者是司馬彪。

范曄出身於南朝劉宋時期的官宦士族，一族從高祖、曾祖、祖父至父親，累世為州刺史、郡太守二千石高官。范氏還是當時的文學名族，祖父范寧曾撰著《古文尚書舜典》、《尚書注》、《禮雜問》、《文集》、《穀梁集解》（後來成為《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注疏》的底本）等，父親范泰曾任東晉朝的國子博士，也有《古今善言》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影響，范曄自幼聰穎好學，年輕時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聞名。范曄年輕時也曾致力於仕途，二十七歲時官場失足被左遷為宣城太守時纔業餘修史，其目的正如他在《獄中與諸甥姪書》中所言：“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後漢書》。⁷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曄因牽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案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尚未完成。

司馬彪出身於西晉諸侯王族，是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司馬懿六弟司馬進的孫子。他因“薄行”不得為嗣，因此折節改志，閉門讀書。晉武帝時任秘書郎、秘書丞、散騎侍郎等職。司馬彪鑒於漢室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⁸另有《九州春秋》、《莊子注》、《兵記》、《文集》多種，均佚。

范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因其魅力不及范書而逐漸被淘汰，惟有八篇《志》因被補入范書而保留了下來。在此，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為何距東漢未遠的晉人司馬彪的作品，反而不敵寫成於此後近百年的范書呢？其中固然有作者個人素養因素，然而這百年之中史書飛躍發展的歷史背景，又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二、 史書大發展時期成書之《後漢書》

與《續漢書》相比，《後漢書》為何後來居上？答案在於范曄《後漢書》創立了新的史料編纂手法，從而創立了新史學。這裏所說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為：“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⁹意思是說：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見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話，就達到目的了。其中所謂的“事”與“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內發論”的“事”與“論”，即史料與史論。

史料“不必多”，即對史料要刪繁就簡。他的這種做法受到唐人劉知幾《史通》的讚賞“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¹⁰史料“不必多”還能使人“見文得盡”，可見此“文”

⁶（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書錄題解》，中華書局，1965年，第402頁。

⁷（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1頁。

⁸（唐）房玄齡：《晉書·司馬彪傳》，第2141-2142頁。

⁹（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1頁。

¹⁰（唐）劉知幾：《史通·補注》。參見張振珮：《史通箋注》，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頁。

必非同凡響，即見史識功底之“論”。其實此所謂“文”、“論”，即范曄本人最為得意的論贊和諸序。他對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評論”很不滿意，說“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相反，對自己的評價是：“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自是吾文志傑斯，殆無一字空設”。¹¹可見，范曄對自己的史論很有自信！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什麼呢？我看他自信引領了一代史學的大變革，《後漢書》能夠藝壓群芳、後來居上也證明了他的自信並非盲目並不過分。

范曄能夠成為優秀史學家，除了本人天賦之外，與他所處時代史學的大發展是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從漢末至隋的約四百年間，史學逐漸形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隋書·經籍志》首次將所有書籍分類為經、史、子、集，亦即將史學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證明。而范曄又恰好生活在這四百年的中間點，范書的形成及價值是無論如何無法與那個時代脫節的。史學在此間有着飛躍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史書編纂方法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化。即從以往的對史料述而不論，轉變為了述以致論，這是一種創新的史學現象，而范曄則堪稱此新史學的創始者！

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選材用料精良，議論評點深刻。前者出自於他獨樹一幟的修史主張，後者得益於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寫作身份。

衆所周知，《史記》曾遭後代學究抱怨語句有不通順之處，清儒方苞在《史記評語》中就批評《刺客列傳》的史料有重複之處。的確，《史記》中是有採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跡。這是因為司馬遷引用史料時更重視取其內容，而基本不對文字做加工潤色。比如他引用《尚書》時大體是照錄原文。又如他 不加刪節地照載秦刻石文等皆屬此類。司馬遷不僅對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從不直接發議論，想要表達的意思或以微言大義手法，或寓義於體例編纂之中。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馬遷修史的原則。

司馬遷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飾的方法，後來為班固忠實地繼承，所以《漢書》也是僅收史料而很少發議論。趙翼《廿二史劄記》也說《漢書》多載詔令、奏議等有用之文。到了晉人陳壽撰寫《三國志》，也基本上對原始史料不加改動地使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三國志》在採用魚豢《魏略》的史料時照用“今云”用語的情況。“今”本是魚豢《魏略》時期的“今”，而非陳壽《三國志》時期的“今”，卻殘留了下來。

使上述司馬遷以來史料編纂法發生變化的是范曄，對此內藤湖南曾指出：“《漢書》、《三國志》以前的紀錄中經過編輯的並不多，更多的還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曄的《後漢書》是各種《後漢書》中成書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經有過七八種《後漢書》存在，而且都是經過編纂的著作，今日作為那些書斷篇的匯集還出版了《七家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就是將這些書消化之後編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曄將以往編纂物作為材料使用時，出現了改寫文章的必要。不僅如此，范曄還是頗有名氣的文學家，畢竟有着經過自己頭腦思考而著述歷史的抱負，他應該還有不滿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寫的原因吧。總之，將《三國志》、《後漢書》所載同樣事例加以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後漢書》有很多地方改動了原文。儘管如此，《後漢書》在史書體裁的根本，還是堅持了《史記》以來的宗旨，而且也像《史記》、《漢書》那樣，在傳記中詳細記載了傳主著作，甚至辭賦等作品。”¹²

總之，對史料進行加工、闡述的新史學風氣，自范曄創始之後作為一種編纂方法流傳下來，它與忠實原始史料的編纂法並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國史學的綿延不絕。《後漢書》是中國史學大發展時期的產物，

¹¹（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0、1831頁。

¹²（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115頁。

也為中國史學真正成為有明確治史主張的歷史科學做出了傑出貢獻！

三、《後漢書》對紀傳體例的繼承與創新

毫無疑問，范曄對史學編纂法的創新，並不影響《後漢書》對司馬遷以來紀傳體例的繼承。這一點只要看一看《後漢書》之篇章結構和作者治史主張，其中不論繼承還是創新都很清楚。

首先，看一下《後漢書》的“紀”。自從《史記》紀傳體編纂體例問世，歷代正史以“紀”、“傳”為基幹敘述歷史沿革脈絡的做法，就成為了一種傳統，范曄也予以了繼承。

《後漢書》所設十卷紀是東漢二百年的編年大事記，為全書的綱要。其中前九卷記載了東漢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曄沒有採取《漢書》那樣一帝一紀的寫法，而是仿照《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後附殤帝，《順帝紀》後附沖、質二帝。其效果是既節省篇幅，又不遺漏史實，又點明了被附錄者的地位。最後一卷是《皇后紀》。這種將皇后入本紀的體例是范曄的新創。《史記》、《漢書》雖然有《呂后紀》，但那是出於承認呂后實際的皇帝權力；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傳》中的。不僅於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後漢書》設置了《皇后紀》，為什麼呢？其實，這是由范曄治史主張所決定的。他在《後漢書·皇后紀》中說：“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指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幃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¹³也就是說此皇后本紀的設立，目的在於反映東漢六太后長期臨朝執政的史實。

再說“列傳”部分，分量在總共的一百二十卷中占了八十卷，這無疑是全書的主要內容。范曄效仿《史記》中列傳以類相從的原則，將生平相似的人附錄於某一個重要人物的傳之中，使得敘事簡潔而周密。不過，范曄對列傳的創新還是非常明顯的，他根據自己對東漢史的理解，在保留《史記》、《漢書》中都有的《循吏列傳》、《酷吏列傳》、《儒林列傳》之外，刪去了《貨殖列傳》《遊俠列傳》和《佞幸列傳》，新增了前所未有的《黨錮列傳》、《宦者列傳》、《文苑列傳》、《獨行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列女傳》等七種，可見改動之大。而且他所新增的各傳，基本上被後人予以承繼，無疑有其開先聲之功。

下面是對范曄新設部分列傳的簡潔概述，由此不難看出作者是如何根據東漢二百年歷史具體內容而獨闢蹊徑的。

黨錮事件直至東漢末年延續了二十餘年，甚至成為漢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東漢後期君權衰弱，朝政為外戚、宦官等當時被稱為“濁流”的腐敗勢力把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有數的昏暗政治局面。為此，士大夫官僚與在野文士兩相呼應，代表“清流”奮起抗爭。由此他們的學派朋黨逐漸成為了政治黨派，所謂“黨人”成為政權的敵人，他們或遭殺害，或被終身禁錮不得為官，最終演變為親屬、門生、故吏連坐受害的慘烈局面。范曄為了重現這段歷史，盡最大努力收集了被迫害的三十五個黨人，將他們

¹³（宋）范曄：《後漢書·皇后紀》，第400-401頁。

排列成傳，即《黨錮列傳》。

《宦者列傳》序文中，范曄在回顧先秦、秦漢歷代宦官事跡的基礎之上，重點對宦官勢力為何在東漢達到極盛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女主臨朝執政以及相應的外戚專權局面出現是主要原因，前者直接造成宦官插手政務；後者在與皇權的較量中，也培育了作為皇帝爪牙宦官勢力的成長。在外戚、宦官兩大集團較量的同時，范曄指出敢於挺身斥責宦官的只有被他稱為“忠良”的士大夫們，但他也看到由於士大夫只會動嘴不會動手，所以不免“言出禍從，旋見孥戮”；最終當軍閥介入鬥爭之後，鼠器俱毀，迎來漢帝國的“運之極”，歷史又回到“漢興”之前的天下混亂狀況！

《後漢書》不再像《史記》、《漢書》那樣設立《遊俠傳》，而是創立了《獨行列傳》。這是古代中國遊俠向獨行演變的寫照。范曄首創的《獨行列傳》中記錄了二十四種不同流俗的獨行者的形象，其中對東漢圍繞名節出現的各式各樣獨特行爲的記載，都是極其珍貴的史料。比如其中的《范式列傳》，本傳以范式千里赴約、死友託夢、護送棺柩等環節，勾勒出當時一位以堅守信用、重視情義、特別獨立、卓行善事而受愛戴的獨行者的形象。

自西漢劉向撰述《列女傳》以後，是范曄第一次將此體例引入紀傳體史書，而且成爲了後世撰寫《正史》的一種體裁。《後漢書·列女傳》為十七名典型的女性列傳，反映了東漢以及此後一個時期社會的女性觀，是一部難得東漢女性史。值得注意的范曄並未宥於劉向《列女傳》的七類標準，並在《序》中明確指出“但玖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盡管如此，縱觀列爲傳主者大致不外“節義”、“才辨”兩類，比如其中的樂羊子妻屬於前者。

這些新增列傳都是反映東漢歷史實際情況的創新。如東漢後期黨錮大興，衆多清流大臣被誣陷以黨人罪名殺害；另一方面，由於東漢女主長期執政，導致宦官多參與朝政，他們殺戮作爲政敵的士大夫官僚，是黨錮之禍的主要製造者。范曄正是根據這些史實，創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雖然最早始於西漢的劉向，但是將《列女傳》列入正史的手法，則是從范曄開始的。再聯繫上述《皇后紀》的創設，讀者不僅可以看到東漢女性的某些實況，也能感受到南朝人范曄的女性觀。特別是范曄不僅收入貞節烈女，同時收入文學才女的做法，更是難能可貴。他根據自己所定“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的標準不但收入了才德兼備的班昭，也收入三度改嫁的蔡琰。這是後代那些拒絕將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收入《宋史·烈女傳》的儒生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范書“列女”與後代“烈女”的區別所在。

最後，說一說《後漢書》“志”的情況。當然嚴格地講應稱爲《續漢書》的“志”，即上文已經談到的司馬彪的《續志》。必須指出的是，范史缺“志”並不是作者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他在《獄中與諸甥姪書》中曾提到自己“欲徧作諸志，《前書》所有者悉令備”的寫作計劃。¹⁴他原定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卷，與《漢書》相應，但在動筆寫志時他就被殺害了，致使范史出缺。當然，除了遭遇不幸的意外原因，范曄未來得及完成志的一個理由恐怕還在於，撰寫志的難度較大。其實，史書的編纂之中“志”從來被認爲是最難的，就連班固的志也曾遭人非難，可見不是什麼人都能寫好志的。從這一點來看，像范曄這樣才華出衆的秀才，未能為我們留下他所欲徧作的“諸志”，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好在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至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拾遺補闕的功效。

司馬彪的八志分別是：《律曆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百官志》記載了東漢的地理、官制情況，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是了解和研究地理歷史、官制沿革的重要史料。《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車仗、服飾等典章制度。

¹⁴（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1頁。

在此，還有必要交待一下筆者向讀者推薦的選篇以及選篇的標準。其實，這與選篇人的主導意識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對於一部名著，讀者、學者、編者都會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予以審視。那麼，筆者是如何給《後漢書》定位的呢？我稱之為“‘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其中的關鍵詞為：“前四史”、“後漢”、“多創新”、“成書最晚”。圍繞這四個關鍵詞，筆者建議讀者：一、遵循正史紀傳體的結構體例。對“紀”、“傳”、“志”三種體例全部讀到。二、選擇最能反映東漢帝國之創建（開國帝王將相）、中衰（皇后、外戚、宦官、士大夫）、崩潰（軍閥）等階段性的篇章重點閱讀。三、重視上述范史新增的項目（如上文所列）。四、重視那些體現漢代以後六朝文風的片斷（如《黨錮列傳序》）。

四、如何閱讀與欣賞《後漢書》

如何閱讀與欣賞《後漢書》呢？這也是個學生經常提到的問題。雖說回答可以是見仁見智的，但就我個人觀點而言至少有以下三個看點，是讀者絕對不能漏掉的。

第一，特別關注那些新設置的紀、傳、志。正像上文所介紹的那樣，《後漢書》所有新增項目都是作者別具匠心的安排，而且其中多數為開後世先河之作。如果能抓住這些創新點，有意識地與《史記》、《漢書》中已有的傳統項目進行對比的話，更容易發現東漢帝國的特色，從中發現讀史的樂趣。同時還建議讀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維，根據不同的項目之間內在的相關性進行適當的排列組合。例如把《黨錮列傳》與《宦者列傳》作為一組；《皇后紀》、《列女傳》為一組；《獨行列傳》、《逸民列傳》為一組；《循吏列傳》、《酷吏列傳》為一組；《儒林列傳》、《文苑列傳》為一組；或者《方術列傳》與《五行志》為一組；對那些個別人物傳也不妨按文臣、武將，外戚、皇室，甚至某一時代為一組。總之，按照自己的口味，憑興趣閱讀的話，你一定能體會到讀史書其實就像欣賞一幕一幕歷史的話劇。

第二，閱讀書中的“論”和“贊”。無怪范曄對自己的“論”、“贊”很自得，確實都寫得很精彩，經常給人以搔到癢處的感受。例如《黨錮列傳》中既稱頌匹夫“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又批評黨人“望門投止”連累他人。《宦者列傳》中既斥責侯覽等人“凶家害國”也讚揚蔡倫等“一心王室”。《隗囂傳》中雖寫出了隗囂搞小王國終究失敗的結局，但評論說“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類似的評論在《後漢書》中隨處可見，以致趙翼《廿二史劄記》稱其“立論持平，褒貶允當。”

第三，欣賞那些描述人物、事件的文筆。范曄以“善為文章”著稱，《後漢書》的文筆中國史書中屬上乘。以范曄塑造人物形象為例，《馮異列傳》中寥寥數語為讀者勾勒出一位獨屏樹下深思的“大樹將軍”；¹⁵《董卓列傳》中寫董卓死後，寫守屍吏燃火置董卓臍中，竟然“光明達曙”。¹⁶在不違背基本史實的前提下，對史料作適當的加工潤色，這是范史的創新和特色。作者的文才活化了歷史人物，像華佗的神奇醫術（《華佗列傳》）、嚴光的狂放不羈（《嚴光列傳》）等等不勝枚舉！

又由於范曄生活在駢體文流行的年代，所以行文中不乏辭采精美的駢文佳作。

當然，閱讀任何一部作品都應該對其弱點、缺陷有清醒的了解。《後漢書》最大的不足之處，是它有缺項。

¹⁵（宋）范曄：《後漢書·馮異列傳》，第642頁。

¹⁶（宋）范曄：《後漢書·董卓列傳》，第2332頁。

第一，《後漢書》缺少《史記》、《漢書》都有的“表”。《四庫全書總目》就說：“昔司馬遷作《史記》，始立十《表》。《梁書·王僧虔傳》稱其‘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班固八《表》，實沿其例。范蔚宗作《後漢書》獨闕斯製，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記傳之內，不能絲聯繩貫，開帙釐然。”¹⁷爲了彌補這一缺陷，從宋代至清代學者中甚至興起了一種爲《後漢書》補表的風氣，出現了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明末清初萬斯同《歷代史表》、清儒的補表有：錢大昭《後漢書補表》、黃大華《東漢中興功臣侯世系表》、《東漢皇子王世系表》、華湛恩《後漢三公年表》、練恕《後漢六卿年表》等，不僅《後漢書》進而還擴展至《三國志》，中華書局匯集這些補表出版有《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

第二，是“志”的闕如。司馬彪的志雖有補缺之功，但遺憾的是缺少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係都相當大的《刑法志》、《食貨志》、《溝洫志》、《藝文志》四志，這顯然與范曄“《前書》所有者悉令備”的願望有很大差距。爲此，清代學者除了補表之外，還有些人致力於補志的學問。例如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姚振宗《後漢藝文志》、顧櫟三《補後漢書藝文志》、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並考》等。

第三，雖然加工、潤色史料是范史的創新，甚至可謂史學編纂法上的突破；但是畢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也有史料失實的危險。所以研究者在利用這些史料時要慎重，有必要合參同時期的其他材料。因爲范曄在撰寫《後漢書》時，應該參考了他以前的東漢劉珍等《東觀漢記》、三國謝承《後漢書》、晉司馬彪《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還有薛瑩《後漢記》，張瑩《後漢南記》、張璠《後漢記》、袁宏《後漢記》等書，所以了解這些後漢書的輯佚本也很有必要。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是目前較好的輯注本。

五、《後漢書》的注解、版本及其參考書

首先，關於《後漢書》的注解。早在南朝梁人劉昭（約五一零年前後在世）就已經爲《後漢書》作注了。由於劉昭上距范曄去世不過五六十年，范曄所能見到的各家後漢書尚未散佚，所以他有條件對范書進行史實的補充。可惜他的注解後來也散佚了，現在能見到只有他爲司馬彪《續志》所作的“八志注”了。

到了唐代，唐高宗之子李賢與張大安、劉納言等人，在高宗上元（六七四-六七六）、儀鳳（六七六-六七九）年間爲《後漢書》作注，今天通行的《後漢書》紀傳部分就採用了李注。與劉昭做注重在史實的補充相比，李賢等人的注側重詮釋字句。王先謙說他注《後漢書》不比顏師古注《漢書》差，可惜所注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處。實際上李賢立爲皇太子以後，才跟張大安等人一起注《後漢書》，至他被廢爲庶人，注釋工作結束，前後不過六年，沒有充裕的時間詳細校訂，略漏在所難免。不過，畢竟由於他們還能見到關於後漢的其他史書，所以校正了范書的許多錯誤，還標注了《後漢書》各種史料的來源，是今天研究東漢歷史的重要依據。到了清代，先有惠棟的《後漢書補注》，在此基礎之上王先謙又廣羅衆人成果，撰《後漢書集解》，成爲研究《後漢書》重要的參考材料。

其次，《後漢書》的版本。宋版有北宋乾興（一〇二二）刻本、南宋紹興年間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南宋錢塘王叔邊刻本。南宋紹興刻本是現存最早而且較完整的版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

¹⁷（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第402頁。

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就是以紹興刻本為底本。元版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寧國路儒學刻本。明版有南北國子監刻本、閩本（福建周採等刊刻）、汲古閣本（毛晉刊刻）等。清代詔修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後漢書》是按照明國子監本翻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監本在合刻時刪去了司馬彪的名字，而且將劉昭的注補改寫為補並注，清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續漢志是南朝梁人劉昭補充並注釋的。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以百衲本《後漢書》為底本，對校以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的紀傳部分及李賢的注放在前，司馬彪的續志及劉昭的注放在後，而且分別寫明作者姓名，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再次，其他參考書。《後漢書》的校補考訂之作，較重要的有清儒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後漢書》部分、錢大昭《後漢書辨疑》、周壽昌《後漢書補正》、李慈銘《後漢書札記》等。